

中国农业经济评论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04 Vol. **2** No.3

- 首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
-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
- 超市为中国农业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效应研究
- 中国省别食物供求模型的开发与预测
- 农业研究与推广对尼日利亚农业增长的影响(1981—2002)

2-3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经济评论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04 Vol. 2 No.3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农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农业经济评论 . 2004. 2. No. 3/辛贤, 王秀清主
编.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4. 11
ISBN 7-109-09265-8

I. 中... II. ①辛...②王... III. 农业经济—研究—
中国 IV. F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2417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026)

出版人: 傅玉祥

责任编辑 柯文武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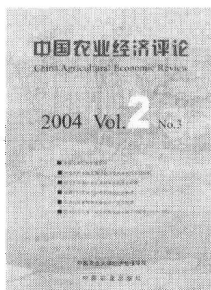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9.5

字数: 230 千字 印数: 1~1 500 册

定价: 30.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由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业经济评论》，采用匿名审稿制度，发表原创性研究文章，倡导规范、严谨的研究方法，鼓励理论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学术取向，为国内外农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

《中国农业经济评论》为16开，每年1月、4月、7月和10月出版，全年共四期。中英文投稿均可。

Published by the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provides a forum for innovative and scholarly work in areas of the economics of agriculture,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rural development. Contributions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are encouraged from scholars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The Journal aims to appeal to a broad spectrum of academics and policymakers.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is anonymously reviewed and published quarterly.

主 编 辛 贤

副主编 武拉平

学术委员会

主 任 王秀清 田维明

委 员 (按拼音字母排序)

Albert Park 美国密歇根大学

Henry Kinnucan 美国奥本大学

Kevin Parton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Kevin Chen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Scott Rozelle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

Won W. Koo 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

八木宏典 日本东京大学

毕井泉 国家发改委经贸司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锡文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

程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杜 鹰 国家发改委农经司

傅玉祥 中国农业出版社

何秀荣 中国农业大学

黄季焜 中国科学院

蒋乃华 扬州大学

柯炳生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卢 锋 北京大学

卢凤君 中国农业大学

梅方权 中国农业科学院

钱克明 中国农业科学院

秦 富 中国农业科学院

谭向勇 中国农业大学

田维明 中国农业大学

王秀清 中国农业大学

王志学 科技部

温思美 华南农业大学

武拉平 中国农业大学

辛 贤 中国农业大学

张晓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耀辉 北京大学

赵 阳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

钟甫宁 南京农业大学

周章跃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目 录

- 269 首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
- 270 陈锡文 关于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
- 278 杜 鹰 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
- 282 韩 俊 中国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的协调发展
- 286 柯炳生 对我国粮食问题的判断和认识
- 290 谭向勇 教育和科技：农民增收及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
- 293 姚耀军 Yaojun Yao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
An Empirical Research into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 304 胡定寰, T. Reardon 罗斯高, Peter Timmer 王红林
Dinghuan Hu, Thomas Reardon, Scott Rozelle,
Peter Timmer, Honglin Wang
超市为中国农业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The Emergence of Supermarke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 329 刘秀梅 田维明 Xiumei Liu and Weiming Tian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效应研究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to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in China: The Impact on Economy
- 355 陈永福 Yongfu Chen
中国省别食物供求模型的开发与预测
China's Provincial Food Supply and Demand Model and Its Projection
- 406 O. I. 奥拉德利 OLADELE, Oladimeji Idowu
农业研究与推广对尼日利亚农业增长的影响 (1981—2002)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Indices as Determinants of Agricultur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Nigeria: 1981—2002

首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系于农村，中央提出要更加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促进实现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目标，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农村工作，为国家解决“三农”问题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整合资源，提升研究能力，中国农业大学决定成立“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并特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研究员任中心主任。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还聘请了校外有关农业问题研究专家 28 人，组成了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共有校内外专家 46 人。

2004 年 5 月 15 日上午 8:30 在中国农业大学新报告厅举办了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首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成立大会由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主持，会议首先由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致开幕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教育部部长助理李卫红、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为中心揭牌。李剑阁副主任、赵沁平副部长、范小建副部长和陈锡文主任分别致辞。大会最后由陈章良校长和陈锡文主任向中心聘请的研究员颁发了聘书。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的成立是学校加强“三农”问题研究的新起点，中心的宗旨是致力于对“三农”问题中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为国家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咨询，成为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首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的主题是农民增收及国家粮食安全。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锡文研究员，以及中心 4 位研究员，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农经司司长杜鹰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研究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柯炳生教授和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谭向勇教授作了主题报告。

关于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

陈锡文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在“五一”期间，回良玉副总理在安徽视察的时候在座谈会上明确讲到关于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将是我们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农业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首届论坛选择“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这个题目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工作的主要目标为什么要确定为这两个？关于农民增收问题，因为持续七年以来，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增长相对迟缓，在过去的七年中，农民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4%，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不足相比，只相当于城镇的一半。正因为这样，在过去七年中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所以要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去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就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今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明确地把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作为这个文件的标题和主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已经看到2004年第一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增长速度已经开始回升，到2004年第一季度农民现金收入的增长速度已达到了9.2%，比2003年第一季度7.5%要高了不少。同时，由于2003年第二季度正好陷入了“非典”的冲击，所以2003年农民第二季度的收入增长是负增长，-3.3%。从今年的状况看，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因此，可以预料，2004年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会有一定的回升。但是，大家都知道农民的人均收入基数比较低，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622.2元，与城市居民的8474元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差距达到了3.23:1。所以，从增长的速度和追赶的速度来看，要使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逐步地接近城市居民的收入还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任务，同时还必须认真研究应采取什么样的途径和办法才能使农民的收入有较快的增长。

很多同志都知道，2004年第一季度之内，中央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出台了一系列含金量很高的政策。不仅在1号文件中，而且在后来的“两会”期间，一直到3月下旬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出台了一系列大的政策。其中很多同志知道受惠最多的是东北的黑龙江和吉林，这两个粮食的生产区。由于粮食主产区拿出40%的风险基金，去直接补贴种粮的农民，

由于在黑龙江和吉林实行了取消农业税的试点工作,由于对东北农民种植梗稻给予粮食补贴等一系列措施,预计黑龙江的农民 2004 年仅仅靠政策这块儿的力度就可以人均增长 277 块钱。也就是说,如果别的都和 2003 年一样的话,2004 年黑龙江的农民大概已经有了人均增收 11%~12% 的基数。所以,黑龙江省明确提出要在政策增收的因素之外,使得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再增加 5 个百分点。当然,黑龙江是个特例,因为它在这一轮的政策执行中获得的收益是最大的,但是在大多数地区,一般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可以从政策因素中大约增收 50~55 元。也就是说,从政策因素中可能增收接近两个百分点。50 块钱可能对于城镇正常的工薪收入者并不当回事儿,但是对农民来说,在很多地方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珍惜的数字。但是,大家也看到,为了给农民增加这笔收入,对于国家的财政来说,从中央这一级的财政和 2003 年相比,大概就要增加支出 440 个亿。但是,从每一个具体的农民来说,他得到的收入相应数额还是比较低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采取政策措施、补贴政策对于支持农民收入是一个途径,但是要想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它还是做不到的,还必须采取其他各种办法。那么到底要采取什么办法?从总体来讲,就要按照市场需求、依靠科技的进步来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但这其中需要解决些什么问题?这正是农村政策所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从粮食安全的角度讲,为什么从 2003 年年底开始党中央国务院突出地强调要促进粮食的规模和增产,因为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现在,确实,粮食安全这个概念,很多同志不大讲,包括搞农业、农村研究的同志也不大讲。因为我们在这中间经历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粮食总量的供过于求。由于粮食的供过于求,导致国内粮食价格的明显下跌,由此也导致农民增收的极度困难。从 2003 年 10 月份开始,第一次市场上持续了六年的粮食价格的低迷开始发生了变化。2003 年 10 月份有一轮粮食价格上涨。2004 年 2 月底到 3 月份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价格上涨。像大米这样的品种,到 3 月底的价格和 2003 年同期相比差不多上涨了 50%,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速度。所以在这样的时期,我觉得采取一系列支持农民增加粮食的政策是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政策有推动,市场有拉动,农民就一定会有更高的积极性。但也有很多同志对增加粮食生产是不是有必要,或者采取这样一种政策是不是非常合适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种看法说希望粮价会有进一步大幅度的上升,这样才能给农民增收带来更多的机会。我觉得这个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粮价涨到什么程度才能既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又保证大多数消费者的利益,尤其是中低收入者,能够不影响他们的生活,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大政策问题。在座的老师可能都经历过,很多同学有可能记不住了,比如说 1993 年底中国曾经出现过一次大幅度的粮价上涨,这导致了 1994 年整个物价水平的明显上涨,迄今为止改革开放二十五六年以来,1994 年是我们物价指数最高的一年,那一年物价指数涨到了 21.7%。有些专家分析认为,这 21.7 个百分点中大概六成的因素来自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所以必须认真地考虑粮价的合理水平和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

也有的同志觉得,国内粮食如果不够,多进口一些行不行?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实行了市场经济,又加入了世贸组织,两个市场总比一个市场安全,我觉得这个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也必须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国际粮食市场的过程一直存在。无非是有时候进口得多,有时候进口得少,那要根据国内的粮食供求、价格水平来决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和国际粮食市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座的很多老师同学可能还都记得,1995年是中国历史上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最多的一年,那年进口的粮食超过了2 000万吨。在这之后,由于国内粮食供大于求,所以,中国转入了一个粮食净出口的国家,一直到去年中国的粮食都是净出口的。但是国内的粮食生产正在发生变化,可能有的同志已经知道,从2003年年底到2004年年初,从国际市场增加粮食进口的决策已经形成,而且实际行动也已经开始,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到底进口多少粮食才对国内的粮食安全不构成威胁,对国际的粮食市场也不至于带来太大的起伏和波动,这也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重大政治性问题。

有些同志讲,我们过去曾经进口粮食超过2 000万吨,现在再多进口一些有什么不得了的,但是实际上按照中国的粮食口径分析,我们这几年进口的粮食始终没有一年是低于2 000万吨的,仅仅大豆这一项就超过2 000万吨,更不用说加上其他谷物。从这角度去看,如果进口谷物加上进口必需的大豆,我估计实际上2004年和2005年的粮食进口量都可能超过1995年。所以,不存在拒绝国际市场的问题。只不过是要考虑和国际市场之间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合理的关系。从这一轮的粮食涨价中大家明显地感觉到,在中国统计的各种粮食品种中,涨价幅度最大的是稻谷,由此也就说明国内的稻谷供求矛盾是比较突出的。但是,各位专家都知道,在国际市场上用于国际贸易的稻谷数量是各类粮食品种中比较少的一个品种,在正常年景下从来没有超过一年交易3 000万吨,2004年的交易量大概在1 800万吨左右,1 800万吨左右的大米大概相当于我们在历史最高峰的时候湖南一个省的粮食产量。所以,到底对于国际市场的利用能达到什么程度,我想这不单是一个总量平衡的问题,还要考虑到其他方方面面的因素。

讲到粮食问题,大家还谈到,有些同志提到我们过去几年连续的丰年有余,库存粮食很多,这点讲的也是事实。利用库存粮食来保证现期的供求平衡,实际上这几年一直是在这么做的。从事农业研究和农产品研究的专家们都知道著名的蛛网定律,简单地讲蛛网定律就是:农产品当期的价格决定下期的产量、当期的产量决定当期的价格这样一个轮回。大家能感觉到从1996年至今或者说从1996年到2003年10月份,粮食这个品种的市场价格一直在下跌,处在低迷。所以,粮食产量在进入2000年以来一直是在下滑,在座都知道去年粮食总产量只有4 307亿千克,它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98年减少了816亿千克。和我们的需求相比,首先还需讲到底现在中国总需求粮食是多少?这实际上也存在着不少争议,但是无论如何,需求是在不断增长。同时,无论如

何 4 300 亿千克的供给和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可以这样说,从 2000 年开始我们就需要动用库存来弥补当年粮食生产和需求之间的缺口。这个缺口实际上靠库存来弥补已经进入第四年。所以我想就算有再多的库存,如果产量也就是当期的供给不恢复的话,库存一定会降到不能支撑的地步。所以,我觉得从生产的角度看、从贸易的角度看、从库存的角度看,现在确实到了需要认真研究粮食安全问题的時候。这个讲法并不是说现在已经不安全了,现在已经供不应求了。粮食问题大家都知道,它和任何产品相比都有它的特殊性,因为粮食对一个十几亿人口,对我们国家来说,一天三顿都离不开的商品。很多专家、很多部门的领导讲,目前煤电油运全面紧张,这对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和粮食出现紧张相比,它们都还有办法,而粮食出现真正短缺以后,能采取的措施是不多的。因为从煤电油气的紧张角度看,为了保证居民的生活,可以停一部分生产都不要紧,即使采取行政手段。但是,粮食没有一个人可以哪一天不吃。正像在农经学界也很有名气的美国的莱斯特·布朗在接受采访时讲,石油为什么和粮食不一样?因为石油有替代品,而粮食没有替代品,或者说食品没有替代品,食品只能靠农业提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中央目前提出研究粮食安全问题,促进粮食生产的恢复和增长,应该说是具有重要的战略考虑的。

同时大家都知道,粮食不能到没有那一天再想办法。生长期周转最短的粮食大概要至少在 100 天之内才能吃到。所以,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必须未雨绸缪,先期进行。从这个角度去看,我觉得从 2003 年年底到目前,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的政策,确实是在围绕着粮食和农民增收这两个重要的问题,这两件事可能是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关注和加强研究的事情。虽然在 20 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大家已经感觉到,粮食每一次活动的周期波动,大概都不会短于三年,通常都在四年左右。所以从现在开始,要想把我们的粮食产量恢复起来,不经历一个过程是做不到的。更重要的还有,我们也确实需要清醒地认识。我们曾经骄傲地说,我们的粮食产量在 20 世纪末,生产能力达到了 5 亿吨,那我们现在到底还有多少粮食生产能力?这个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因此,有些对农业不太了解的人,他们考虑的问题,往往这样考虑:1998、1999 年粮食产量都超过 5 亿吨,所以只要政策到位,只要市场价格足够高,粮食总产量恢复到 5 亿吨是做得到的。我说不见得,而且很不见得。因为这些年来,我们在粮食方面上损失的生产力应该说非常明显也非常大。再一个值得重视的数据,2004 年年初国土资源部公布的:耕地的总面积在过去七年之中整整减少 1 亿亩,从 19.5 亿亩的耕地减少到 2003 年年底只有 18.5 亿亩。当然,这 1 亿亩耕地,有的可能质量很高,比如说大中城市周边的具有最完备排灌系统和非常肥沃的这些土壤没有了,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是生产力很低比如说中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那部分土地。但是,我想提出两点,第一,这 1 亿亩耕地打得住打不住,是不是就真损失了 1 亿亩。从最近对土地市场的清理整顿来说,发现了大量的未经批准因此也可能未进入统计的被占用的农

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非常说服人的数据就是:2003年和2004年的净减少,我讲的都不包括复垦的在内,2003年的净减少是3800万亩。因此需要认真考虑我们现在到底还有多少粮食生产能力,要把减少了的耕地生产出来的粮食恢复到1998年的水平,甚至把它进一步提高,都需要采取什么措施。这也是政策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就像刚才几位领导和专家谈到的,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发展,绝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粮食和农民的收入问题,其实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比这些多得多、也深刻得多,那就是党的十六大提出来的小康建设现代化的目标。如果要按十六大提出的要求来看,我们距建成全面的小康社会现在还剩下十六年多的时间,离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也就剩下40多年时间。这个应该说是农村的政策研究、农村的经济技术研究来说是更为紧迫的、更为严峻的任务。更重要地,很多专家讲到,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如何才能使得农业、农村的发展不拖整个国家和民族现代化建设的后腿,这是现在在座的师生和研究人员需要共同承担着的重要任务。

党中央领导同志已经反复讲过。2003年年初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曾经讲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这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十几年的时间,北京、上海、广东、深圳建设成小康社会,我一点都不怀疑,甚至远远超出。但问题是农村会怎么样。我36年前下乡到农村,在农村度过了十年,现在离开农村26年,我坦率地说一句,即使到我26年前离开的地方去看看,我总的感觉变化是很小的。这么广袤的农村大地在26年中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凭着现在的做法,能不能使农村也实现全面的小康?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去考虑的。如果这一步做不到,我们可以说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基本现代化建设也一定做不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任务是非常繁重和紧迫的。但问题还在于,不仅仅是目标艰巨、任务繁重,更重要的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也是很严酷的。要想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毫无疑问,不保持国民经济比较高的增长率,就业问题、财政收入问题、对农村的转移支付问题等等都会面临很多矛盾。但是,如果只追求GDP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又会出现一系列的不平衡。这样一些矛盾,实际上对我们可选择的途径给出了很严酷的现实。因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提出“五个统筹”,我觉得是在引导我们认真的考虑,不仅要考虑这个目标能否实现,更要考虑我们有多少选择余地、我们有多少风险。

提出五个方面的统筹——“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的统筹”、“对内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统筹”,这说明存在着不协调的方面。我觉得把“城乡统筹”的要求放在第一位,就表明了城乡的不协调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最突出、最有制约性的大的矛盾。但是去解决它,现实中又遇到很多挑战和问题。比如说从2003年年底到现在关于土地市场的治理整顿,关于严格保护耕地问题,在社会上就会听

到非常不相同的声音。人家说不让占地，尽管保护了农民的权益，但是却失去了经济增长，最后也不能让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来就业，也不能带动农民富裕；也有同志说，国内的耕地减少一些，从国外更多地进口一些粮食，不就是从国外进口土地和水资源吗？所以，这里确实实有很多问题需要进行认真地研究和探讨。一个决策做出来，坦率地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所带来的惯性和后果不是制定决策的人能改得了的。比如说关于开发区的建设，大家都知道，开发区建设是改革过程中的一个转型，而事实上它也为我们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曾经有一个省的常务副省长跟我讲，你不要看我们全省的开发区面积没有多少，但是它在我们的 GDP 增量中占到了 60%，所以我不搞开发区，我这个省的经济就没法增长。所以，开发区的政策就出来了。但是这样的开发区政策就像在座的许多同志都知道的那样，经过清理整顿，经过清点，全国国内有各级各类开发园区 6 015 个，其中 70% 的没有经过符合规定的审批程序，4 200 多个没有经过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审批。这 6 015 个开发区一共占有的土地面积是 3.54 万平方公里，比一个海南岛还要略大，比我们国家全部城镇的建设面积（不到 3.3 万平方公里）还要大。现在要去纠正，你说有多大的难度？所以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在今后选择余地不多的境地下推进改革和发展确实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我刚才之所以说到我们今后的发展任务非常艰巨，可供选择的余地、限制条件非常多，就像最近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从国际国内听到的呼声理解的那样，对我们今后这样繁重的发展任务，必须是在国内协调发展、对外和平崛起的环境下进行，破坏了这样一种格局，如果国内不是协调发展，如果对外不是和平崛起，很可能连我们现在的大好局面都很难保持下去。但是，要实现国内协调发展，就像我刚才讲到，需要协调的方面很多，城乡之间协调的任务就极为繁重。因此，要在协调发展的这样一种政策思路下，安排好各项政策，这绝不是一项容易的事。比如说最近大家争议比较多的退耕还林，退耕还林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恢复我们国家生态环境的重大政策措施，而且出台以来到现在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1 亿多亩不应该耕种的土地被退耕还林，它产生的效益不仅是我们这一代，子孙后代都可能享受到。但是，退耕还林之所以有这么快的推进，是由“以粮代赈”政策做基础。粮食供求关系一旦发生变化，“以粮代赈”还能坚持多久？还能怎么坚持？这就需要认真考虑。如果说考虑到目前的粮食供求关系，只是缩小或者减慢退耕还林的步伐，这当然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是对于已经育好树苗、挖好了树坑、准备在那儿退耕还林的农民来说，你这个决策对他简直就是灭顶之灾。我看到一个材料，反映西部有一个农民育好的树苗卖不出去，因为退耕还林的面积缩减了，只能把幼小的树苗晒干当柴烧。这个农民非常痛心地说如果这些树苗按照它应有的价值出售的话，我这一顿午饭等于烧掉了五六十元钱。粮食的安全、粮食市场的稳定和退耕还林仅仅是一种农业内部的事情，去怎么协调，这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更不用说其他的方方

面面。所以,要确保国内首先协调发展,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我们包括研究农业农村经济、研究农村技术的人脑子里都要有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图像,不能仅仅为你考虑的东西提供一个有益的政策而损害了其他方面的利益和发展,这个政策是社会不会承认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同时,对外的和平崛起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它决定我们今后的发展是什么样的环境。2003年我们人均GDP超过了1 000美元,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值得鼓舞的成就,但是坦率地说,大家看一看世界经济水平,人均1 000美元在全世界是相当低的水平。我们以占全世界20%的人口,2003年创造了不到4%的世界GDP,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状况。但是我们2003年消耗了全球7%的能源,消耗了全球23%的钢材,消耗了世界40%的水泥。这些对我们来说有一个自身能否持续的问题,而对世界来说产生了某种担心,中国的发展到底需要从它的外部社会吸取多少资源,世界能不能承受?因此,为什么要提出和平崛起?那就是中国政府历来在世界上讲的,我们绝不称霸,绝不掠夺资源和市场采取侵略措施。但是必须认真考虑,我们这样一种消耗水平的增长,如果一定走坚定不移的和平崛起的道路,我们在国内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造?对农业也是如此,2004年国内的粮食供求关系稍有变化,国际上对中国粮食需求的前景就议论纷纷。布朗1994年曾经发表过《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而没想到中国从1995年到1999年中国连续五年丰收,从净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他没话可说了。1996年我跟在座的杜鹰司长一起在美国哈佛大学参加东西粮食展望的时候,布朗先生在场,我记得当时哈佛大学非常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杰弗逊·萨克斯对布朗教授提的问题非常尖锐,他跟布朗说你在1970年就预测了全球的石油消耗只够25年,今年已经第26年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说你如此关心粮食问题,为什么盯着中国不放,而不去研究非洲?我觉得这两句话讲得非常深刻,当然他有他的各种各样的考虑因素,最后我们在跟他讨论的过程中,他在大会上公开宣布一句话:我不是经济学家,因此预测未来的粮食供求不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是给你们敲敲警钟。最近,他又一次开始敲警钟,又一次讲到中国的粮食问题。但是必须看到这不是简单的专家学者的议论,他的结果往往带来世界粮食市场的大幅度波动。因此,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为什么说中国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走一条消耗少、污染低、科技含量高、效益高和能够吸纳更多劳动力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它对我们农业又有什么要求?我们农业农村的发展,从我们农村的政策研究、理论研究,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研究,我想至少要考虑三个层次的问题,就是当前的政策重点是什么?刚才讲了就是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而追求这样的目标,你不能破坏的格局或者说你中长期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全面的小康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基本现代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研究第三个问题,当确定目标,提出愿望之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选择,有什么样的途径和措施去逐步地接近这个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那就是我们从现实的起点到最

终要达到目标这个过程之间的一系列中间环节。这些环节的制约因素是什么？所以，在“中心”成立的第一天，我们的研究就要紧密地为实践服务，要紧密地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服务，既要为当前粮食增产增收出谋划策，又要为怎么样在保持协调发展的前提下实现农村的全面小康服务，更要考虑，从长期来看作为在世界上有着重大影响的人口大国，怎么真正做到国内协调发展，在世界上和平崛起，不仅使得中华民族真正能够矗立于世界之林，而且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矗立于世界之林的时候，能够和全世界和睦相处。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我相信在座的广大师生和各方面来的研究人员，一定会为此竭诚地做出努力。

（本文根据 2004 年 5 月 15 日在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首届论坛上的发言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

杜 鹰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经济司司长
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当前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有两个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一个是农民增收困难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和缓解，而农民增收缓慢对城乡经济的协调和均衡发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制约；第二个问题，2003年入秋以来，国内的粮食价格两度大幅度上涨，预示着我们国家粮食供大于求的格局正在发生极其重大的变化。为此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非常多的措施，包括2004年的1号文件，包括2003年10月28日和2004年3月23日国务院两度召开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对如何促进农民增收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意见和具体的措施。实际情况怎么样？我想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

农民收入是个老问题了，由来以久，但是2004年的开局不错。2004年一季度农民现金收入834元，同比增长9.2%，城镇居民的现金收入同比增长9.6%。是个什么概念呢？农民一季度现金收入的增长幅度是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长也是30多个季度以来的第一次。2004年的农民现金收入，我们做了一个全年纯收入的预测，我预计2004年全国9亿农民平均每人能增收250元，扣除价格因素之后，估计全年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有望达到6.5%甚至是7%，这个速度相当之高，是1996年以来的第一个高速度。

我还要说一下，2004年一季度农民现金收入上去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增加了，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增加无非是出售量和出售价格的提升两个因素所致，由于价格的提升，2004年一季度农民现金收入里出售农产品收入增加的95%要用价格的提升来解释，其中粮食的出售价格同比上升了32%，其他农产品也有不同程度的上升；第二个因素，2004年外出打工看好，因为整个国民经济尽管现在正在进行一些重大的宏观调控，但是可望仍然在高的增长速度上运行，这样整个农村外出务工现在是1.1亿人，他们的收入看好。这块儿农民往年的增量是70~80元，我估计2004年能保持在80元水平；第三个因素是政策性因素，国家采取了取消农业特产税，农业税的减免，种粮的粮种补贴，以及退耕还林，加强基础设施投入，实行“六小”工程等等。所有这些政策性因素，每个农民2004年能得到50元的好处，大概可以提升增速

两个百分点。这是我向大家报告的今年农民增收的开局不错，全年的增长速度也有可能成为近8年来的最高水平。

但是，是不是说农民收入就如此看好呢？我以为农民增收困难恐怕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因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因为短期政策的调整得到根本性的消除。制约农民收入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呢？包括农业劳动生产力的低下，包括城镇化的滞缓，也包括农业结构的不合理，也包括在向现代化转换过程中我们的农产品成本呈加速上升的趋势等等。但是，概括成一句话，我以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根本性的问题是历史性的和体制性的资源配置的错位，突出的表现是农民就业的极不充分。目前我们国家农业的GDP已经下降到14.5%，而农业的就业份额仍然高居50%。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是这样的结构，50%的农业劳动力为国家创造了14.5%的国民财富，而另外50%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他们为国家创造了85.5%的GDP。两者之间，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距，1990年是3.9倍，而到2003年已经上升到5.6倍。什么东西决定人的收入的多少呢？劳动生产率。由此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城乡的收入差距呈现一个不断扩大的趋势。刚才锡文报告了，2003年我们收入的城乡差距已经扩大到了3.23倍，今后也仍然是扩大的趋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可比。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是因为什么呢？是农民懒惰吗？最根本的是资源配置问题。有人算过这样的账，城里人和农村人人均占有的生产资料可以差10倍，因此农村劳动生产率低下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就业不充分，用农民的话讲叫“一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八个月要钱”。城里人一年干300天的工作日，你才种三个月的田90天，你怎么能拿你的收入跟人家比呢？而这样的格局是历史形成的，是长期的国家工业化，把众多的农民排除在工业化进程之外，导致农民人均占有的生产资料和城市的人均工业的装备、人均生产资料占有的巨大差距，导致了如今我们只能看到农民收入的低增长的过程，这样过程可能延续相当长的时间。后来农民说那我离开土地，我去搞工业，也就是乡镇企业。可是你可晓得，当今的乡镇企业已经创造了三分之一的工业产值，而它所有的商业银行总的贷款率所占的比重最高年份也只有8%。如此的体制性的和历史性的不合理的因素，导致的农民增收不是一个简单的、短期内就能得到缓解的问题，就业不充分的问题，农村每年新增就业人口“十五”期间857万，城里的待业和下岗工人每年为他们创造的就业岗位说是800万，那剩下的呢？怎么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呢？这个问题很有可能在“十一五”期间得到缓解，我们算了一下，由于十几年前采取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村劳动力供给到“十一五”期间会骤然下降，甚至到“十一五”后期城市的劳动力供给，不考虑机械性移动的话，是绝对进入负增长，那个时候可能是劳动力转移的非常好的黄金时期。

最近发改委已经启动了“十一五”规划的前期研究，我们想农业、农村、

农民“三农”问题应该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十一五”期间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考虑就是要破除二元经济结构，按照城乡统筹、以人为本的要求，我们怎么样能使众多的农民来分享中国现代化的好处，分享中国工业化的好处，分享中国城镇化的好处。这是我向大家报告的农民收入的问题。

其次，粮食安全。粮食就怎么不安全了？连年丰收，怎么突然提出粮食安全问题？有五个原因。

第一，1999年以来，粮食连续四年减产，每年都有很大的产需缺口，而且产需缺口在不断地扩大，2003年我们的产量是4 306.5亿千克，而2003年当年的需求量是4 880亿千克，当年缺口550亿千克。随着产需缺口的扩大，我还没有算净出口，前三年我们的粮食都是净出口，这样库存挖得很厉害，库存急剧下降。2004年的情况怎么样？由于中央采取了一些政策，现在看只能说2004年的产量有望回升到4 550亿千克，还不敢说十拿九稳。而2004年的国内需求、国内消费量每年是以40亿~45亿千克增长，就是4 900亿千克，就是说2004年我们国内的粮食产量费九牛二虎之力提升到4 550亿千克，当年的产需缺口还有350亿千克。这样，到2004年年底，国家的粮食库存要进一步下降，当然还是在安全线以上；而2005年粮食产量我们预计最多可能恢复到4 750亿千克，这样2005年仍然有产需缺口。所以，如果不从当前就采取措施，把连续四年粮食产量下降的局面有一个根本性的扭转，在2004年、2005年、2006年三年内把中国国内的粮食产量提升到什么水平呢，恢复到国内产需平衡的水平，那么2005年，最晚2006年，中国的粮食要出大问题。这是第一个基本情况。

第二，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是稻谷。粮食问题的研究绝不能停留在总量上，要深入到结构。在三大粮食品种里，当前突出的矛盾是稻谷，稻谷中最突出的是粳米。2003年的产量是1 660亿千克，消费量是1 900亿千克，缺口是240亿千克。现在稻谷库存是整个库存里最少的，而其中大量的库存是超期库存，有相当部分是超期的。刚才锡文同志讲到，1993年那年我们当年的粮食是增产的，怎么到了11月份粮价就暴涨？于是1994年段主任就采取宏观调控措施，要把粮食统起来，什么原因呢？尽管1993年粮食是增产的，但是稻谷是减产的，再加上当年调整汇率，人民币贬值、国有粮库补库等等因素，把粮价抬起来了，牵动了整个粮价和物价的上涨。所以，不可小视结构性矛盾。

第三，粮食生产是个慢功夫，易退难进，退下来容易，你想把产能再恢复起来，难。刚才锡文同志谈到，经过这几年我们的粮食产能是下降的，我们匡算，至少下降了150亿千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耕地被大量地占用。1997—2002年六年耕地被占用了6 100多万亩，2003年一年又干掉3 800多万亩，这六七年就干掉1亿亩。再加上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民近些年对农田的基本建设投入的积极性不高等等因素，导致我们粮食产能确实是下来了。要在这几年把粮食产量搞上去，非常不容易，因此必须对这个问题给予一个充